

明清十大家诗选



何景明 诗选

饶龙隼
选注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明清十大家诗选



何景明诗选

饶龙隼 选注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何景明诗选/饶龙隼选注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9
(明清十大家诗选)

ISBN 978-7-02-006739-8

I. 何… II. 饶… III. 古典诗歌-作品集-中国-明代 IV.
I222.7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43556 号

责任编辑:徐文凯

责任印制:王景林

何景明诗选

饶龙隼 选注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38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0.625 插页 2

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 978-7-02-006739-8 定价 2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前 言

何景明，字仲默，号白陂，又号大复山人，河南汝宁府信阳州人。他生于明成化十九年（1483）八月六日，卒于正德十六年（1521）八月九日，享年三十九岁。

—

何景明虽英年早逝，其生命却充实丰富。他一生充盈着亲情、师恩、友情、节义与忠爱，当然他也怡情山水，适性任真。这一切提供了他诗歌的情感内涵和艺术源泉。

何景明生于下层官吏家庭。祖何鉴，为阴阳学典术，尝代理汝宁明港巡检；父何信，尝任陕西渭源驿丞。可见，父祖辈并无杰出人物，至景明这一代方人才鼎盛。何景明有兄姊五人。兄景韶、景旸皆卢氏母出，景韶举成化二十二年（1486）乡试，官至东昌府通判；景旸举弘治十一年（1498）乡试，与景明同榜，官至安庆府通判；兄景晖、姊某及景明皆李氏母出，景晖不仕，姊适孟洋。在众兄姊中，何景明与伯兄景韶、姊婿孟洋最情深意笃。何景明十五岁从景韶受《尚书》，十八岁随景韶之巴陵令任所，二十五岁值景韶丧而决意归居，可以说伯兄是他的人生向导。正德四年（1509）四月父母亡后，何景明最挂念的就是其姊。他尝作《除夕述哀四首》，诗云：“所亲半重泉，有姊各一乡。”孟洋尝携夫人之官山东，何景明作《送望之赴汶上二首》，诗云：“宾朋半海

内，弟妹各天涯。驻马临岐处，飘飘独望家。”后又作《怀姊》，诗云：“那堪骨肉泪，洒向别离时。……庭闱欣见汝，千里重予思。”这些诗作抒发了浓烈的姐弟之情。弘治十五年(1502)何景明娶张氏，两年后张夫人卒京邸，景明凄然感伤而作《悼亡诗》三首，云：“恍然失所在，零泪空滂滂。”及继娶王氏，他又作《悼往》，诗云：“人生重恩义，况兹比翼乖。何能眷新欢，弃掷故所怀。”何景明有儿女各三人，其中一女年幼夭折，他肝肠欲裂，异常悲痛，作《哭幼女行》，诗云：“女生一岁眉目扬，笑指兄姊罗成行。镜里娇啼映窗牖，床前学步牵衣裳。春风吹魂魂不住，来从何来去何去？……妇人性痴还过伤，奔走叫号如病狂。作诗示妻兼自解，转见人间父母肠。”正是对这些亲人的眷恋，构造成何景明诗歌的情感原质。

何景明生长于成化、弘治之世。此时妇寺干政，厂卫横行；流民作乱，边境未绥；灾变频起，饥馑蔓延……此种种迹象表明，明代政治已呈衰败趋势。但这毕竟是弊政的开始，明初文治鼎盛之遗恩犹存，何景明能以才质颖异获师贤惠顾。李纪、李翰、林翰、李东阳等人的赏拔与扶助，对他早年成长极为重要。对他们的恩情，何景明始终铭记难忘。他十一岁随父之官，获临洮知府李纪赏识，为延师授《春秋》。对李纪，何景明作《忆昔行》诗，抒发对李氏父子的感念：“我年十一十二馀，与子握手相欢娱。严君视我犹视子，日向庭前问诗礼。”当正德十年(1515)四月闻李纪讣，何景明为文遣祭，又作墓志铭，语均极恳挚。他十五岁调试汝宁，御使李翰读其文，惊呼“奇才奇才”，后又亲赴信阳观之。对李翰，何景明作《上李石楼方伯》诗，感念座师的知遇之恩，盛赞他的道德、文章与政事，以他代表士大夫人格理想。何景明进入京城文坛，最初有赖李东阳接引。李东阳也以文衡自任，乐于推毂激赏后进；因之，何景明辈羽翼未丰之时，常预阁臣

领导的诗文倡和。对李东阳,何景明一贯礼敬,永怀感念。当正德初刘瑾用事,李东阳潜移默御,保全善类,因遭气节之士非议。及至刘瑾伏诛,李东阳不自安,乃上书辞官。何景明归居闻讯,遥寄《怀西涯先生》诗,云“归去朝廷公望重,老来湖海路行难”,对恩公表达深切的理解。及正德六年(1511)还朝,何景明又有《上李西涯书》,劝止恩公引疾求退,以挚诚来表示信赖,云:“恐终有以负明公,敢忘其狂昧,布肠腹,惟明公采览,无缪于古大臣出处之义。”正是对这些师贤的感念,奠定了何景明诗歌的人格基形。

何景明交友有多重圈属。在京都郎署文学圈之外,他还领导着信阳作家群。其成员有姊婿孟洋、郟县王尚纲、信阳戴冠、樊鹏、华容孙继芳及其子宜等人。这个作家群组织松散,没有明确的结社意向,主要是追随何景明行动。当何景明与李梦阳交契时,他们也参与“前七子”的活动,如王尚纲跻身何景明《六子诗》,与李梦阳、边贡、康海等并列。及何景明与李梦阳交恶后,他们紧密聚结在何一边,如孟洋以姊婿更兼密友,支持景明最为有力。何景明在京交游广泛,除与郎署作家频繁唱和,还获茶陵派储巏等人叹赏。而他跟郎署作家交往,以与李梦阳交谊最投契。李何两人声气应求,不仅文学上共倡学古,而且政治上相互援助。何景明特重这份友情,尝作《赠李献吉三首》,称李梦阳为知心朋友。又有《六子诗·李户部梦阳》,盛赞“李子振大雅,超驾百世前”。正德七年(1512),李梦阳在江西任上吃狱,何景明上书杨一清乞情。李梦阳称他为“赤心朋友”,何景明作《得献吉江西书》诗,以偕隐山中相回应:“他年淮水能相访,桐柏山中共结庐。”李何如此深厚的交谊,不仅震撼彼此的心灵,而且引发文坛热切关注。因为,郎署作家的核心是“前七子”,而“前七子”的核心就是李何。何景明与李梦阳交契之际,还同其他郎官友好交

往。这包括“前七子”其餘成员,如边贡、康海、王九思、徐祯卿、王廷相等;还有其他学人与作家,如崔铤、吕柟、何璠和薛蕙等人。何景明与友朋聚首京城短暂,从弘治十五年成进士,至正德二年(1507)归居,前后大约只六七年,其间他归娶近一年,出使滇南又一年。至正德六年他回朝前后,边贡、李梦阳、王廷相均外任,康海、王九思等人早归隐。因而他与友朋欢聚时少,遥诉思念之苦更多,尝感叹“十年岐路各苍茫”(《怀寄边子》)。幸好此时他新识薛蕙,神交而“谓我颇同流”(《过君采次韵二首》)。及至正德十三年(1518)七月,何景明出任陕西提学副使,又有机缘与康、王等重聚,其狂喜之情无复名状:“五陵冠剑豪游地,犹是长安旧酒徒。”(《登楼观阁时王令明叔邀张用昭、段德光、王敬夫、康德涵四子同游二首》)至于同崔、吕等人的交游,则是李何分异之后^[1],何景明交友的新取向。盖此时他更重经术世务,特别倾慕关中儒学;因而珍视吕柟为“同心友”(《过吕仲木宅同吕道夫、马君卿》),称赞崔铤有恒德,可“永副平生慕”(《送崔氏四首》)之四。正是对这些友朋的信赖,激励着何景明诗歌的不懈追求。

何景明通经术,尊德性,尚节义,鄙荣利。他虽然不生养于关中,但向慕关中儒学传统,礼敬倡复关学的杨一清,并仰仗之为精神领袖,因而习得关学文化气质。正是秉承这种气质,他才能劲节刚毅,忠直敢谏,不畏强暴,恰似关学创始人张载之“德盛貌严,刚劲敢为”(《二程遗书》卷十程颐语)。及至督学关中,他奋力弘扬关学,以经术世务教导诸生,修订学程,激励士气,作成人才。他还创经说数十条,欲与四川提学王廷相约境上之会,期数月之讲。他又著《何子》十二篇、《内篇》二十五篇等,旨在阐明性理,通达世务。正因何景明儒行醇厚,故其节义凛然之事,常为后世史家称道:(1)正德初,刘瑾弄权。何景明上书吏部尚书

许进,劝其柄政毋挠,语气极为激烈。(2)李梦阳被刘瑾逮系之后,众莫敢为直。何景明上书阁老李东阳,又与康海划策,终免李梦阳一死。(3)正德六年,何景明复官京师,名声日著。正德帝义子钱宁欲交欢,以古画索何景明题。何景明以名笔不可污,留经年而终还之。(4)正德九年(1514)正月,乾清宫灾,何景明应诏言事,谓人事不修,天变将复作,又诋义子不当蓄,宦官不当宠,语极剴切,人为之心寒。(5)正德十三年,何景明任陕西提学副使。锦衣指挥廖鹏弟盩横行关中,其参随遇三司不下马。何景明拘执而鞭撻之。(以上参见《明史·何景明传》)此数事当世震撼士林,后世传为佳话。特别令人钦佩的是,何景明在与李梦阳交恶后,仍未放弃对李的道义担当。虽然他对这段交情有悔恨,尝自省“苟非同根生,缠绵安得固。……深言匪由衷,白首为所误”(《送崔氏四首》之四);但当得知李梦阳处困厄中,他仍义无反顾地积极救助。正德十四年(1519),清查宁王朱宸濠叛乱案,连带出李梦阳撰《阳春书院记》事。嫉恨李梦阳者欲置之死。何景明上书杨一清等,为之讼冤而免其死。而更令人感佩的是,何景明在临终弥留之际,嘱墓文必出李梦阳手。他或许清楚李未必肯作文,却仍向李发出道义约请,此胸襟是多么宽博坦荡。正是对关学节义的认同,涵养出何景明诗歌的浩然正气。

何景明举弘治十五年进士,年方二十就得志,自当胸怀高远,忠君图报。但他因不喜私谒,未能例改庶吉士,初仕就遭受了挫折,两年后始授中书舍人。此后政治情势恶化,实不容志士舒展胸抱;因而,他忠爱之情就凄然失落,转而化为忧愤时事、讽切弊政和哀叹民瘼。延至弘治十八年五月,他奉孝宗帝哀诏使云南,获得入仕以来首次委任。他行至武昌,闻西北边警,忧虑“一时边将当关少,六月王师出塞难。先帝恩深能养士,请缨谁为系楼兰”。(《武昌闻边报》)他行经武陵险山恶水,念及汉代伏

波将军，惟恐不能完成王命，因作《武陵》诗：“伏波有遗响，吟馀转凄恻”，流露对前途的凄茫感。他来到清平县，见县令困苦之状，而作《清平令》诗，表达对下吏的同情。他还有《城南妇行》诗，借一位寡妇的口吻，叙说盗匪侵掠和官军平叛前后的不幸遭遇，用卑弱者的声音，揭露边鄙不绥、盗匪猖獗、官军贪私、民不聊生的现实，控诉统治者“无乃乖天常”。何景明此行经年，至正德元年五月还朝，恰当宦官刘瑾乱政。何景明不安于位，乃于次年辞官归居。他此举虽为全身远害，但并未放弃现实关怀。他在归居乡园期间，有机会体察民病，关心下层的疾苦。如他曾作《官仓行》诗，对照描写饥民之惨痛：“富家得粟堆如邱，大车槛槛服两牛。乡间饿夫立墙下，稍欲近前遭吏骂。”又作《冬雨叹三首》，对乡民的困顿深表沉痛：“乡中饿叟纳官赋，白头赤脚行中路”；“我里四邻久已出，到今不知死何乡”。正德六年何景明还京任职，有缘闻睹国朝种种弊政，并作诗进行深切的讽喻：正德帝昏聩荒唐，好微服出巡，致使朝政废弛，人心惶恐，他作《游猎篇》予以讽谏，诗称“腐儒为郎不扈从，愿奏相如谏猎篇”；边防将士饥寒困顿，而京中贵幸贪图享乐，他作《点兵行》予以抨击，诗云“高马肥肉留京都，可怜此兵击匈奴”；中原一带匪盗猖獗，君昏将弱，民失其所，他作《闻河南寇》予以讽切，诗云“今日至尊忧不细，几时诸将捷音同”；正德帝宠幸宦官近臣，疏远朝中大小臣工，他作《鲋鱼》予以讥刺，诗云“银鳞细骨堪怜汝，玉筋金盘敢望传”……正是这些饱含忠爱之作，标举着何景明诗歌的讽喻之义。

何景明一生忠爱为怀，但当君昏臣暗、宦官擅权，他不仅报国无门，反而遭打击排抑。因而他幽愤愁闷，常作诗宣泄郁垒。他创作了大量的“祖杜”诗，追摹杜诗沉郁顿挫风调。此为的一面，另一面是，何景明也企图摆脱困扰，渴望清静；因而他爱恋自然，

向往归田。他在使滇往返途中,观览湘西、云贵、三峡的奇异山川。一路山水风物变迁,他的感受随着变改,而所作诗也风调雨顺。如《自武陵至沅陵道中杂诗十首》,用新的艺术感受,描绘山水之幽奇,抒写旅途之艰险,随行兴感,寓目辄书。再如《秦人洞二首》,惊叹桃源洞的自然美景,向往秦人清净避俗的生活,诗云:“云锁洞门何处问,花开溪路几人迷”;“家移洞里难知姓,水到人间易问津”。又如《黄陵庙》诗,描写黄陵峡的浩阔和行舟的惊险,令人心悸骨折,荡气回肠。他在归居乡园期间,钟爱家乡的一山一水,品味田园的宁静闲适,享受亲人团聚的欢乐,写了许多田园山水诗,如《还至别业四首》、《观涨》、《望郭西诸峰有怀昔隐兼发鄙志》、《游西山二首》、《获稻》等。如《客至》,描写闲居萧散,颇有趣趣:“野外逢迎少,柴门落叶稠。人闲不扫室,客到始梳头。且为烹茶坐,还因看竹留。登临如有兴,更上水边楼。”还有一首《水曲纳凉》,抒写归居心境,尤为别致:月夜清玩,漱流消烦,优游俯仰,怡情荡志,物我双遣,回归自然。此情不能自己,便放浪起来:“虽无朋侪和,兴言自成歌。娱乐当及时,千秋岂复多。”此外,何景明还偶通道旨和禅趣,达观人生,适性任真。如《鸣蝉》:“清心吾爱尔,长日自悲吟。……偶通观物理,幽意坐来深。”此援引齐物论旨,感通万物,得观物理,以消烦忧。再如《寺僧留宿》:“留宿频经夜,虚空断俗缘。独吟依野衲,不寐听山泉。水月人间地,香灯象外天。何时谢城郭,来此共安禅?”此援引禅家机趣,触境生兴,厌恶尘俗,向往禅境。此类山水闲适任真之作,呈现出何景明诗歌的清丽俊逸。

二

弘治十五年春,何景明赴京应礼部试,举康海同榜进士第三

甲。他旋即请假归娶，次年携夫人至京，造访李梦阳、边贡而语合，因而得预京中名流，名列“前七子”、“十才子”。

此时文学的发展情势是，文柄由馆阁移于郎署。明正统朝以后，君臣倡和的盛况已不多见，文学侍从衰落，馆阁词臣失宠。成化年间，万贵妃乱政，万安擅权，馆阁词臣遭受排抑，渐失领导风雅职能。更严重的是，馆阁词臣出现分异。比如李东阳善诗，门下多词客。阁老刘健忌之，每闻人学诗则叱曰：“就作到李、杜，只是酒徒。”（《诗家直说》卷二）又如杨一清将其《石淙类稿》嘱李梦阳评点，意欲与李东阳相颉颃。李梦阳领会其意，乃称杨诗笔可与李并驾。（《列朝诗集》丙集“杨一清”条）而词臣一旦分异，就会争主文盟，导致文柄不一。从此文柄旁落，失坠不振。更因正德朝以后，刘瑾等残酷打击馆阁词臣，文学侍从凋敝，文柄再无回归馆阁之可能。这就从政治生活层面，为郎署作家崛起让出空间。

与文柄旁落相呼应，馆阁文学亦肤弱无骨，靡敝至极。针对这股痿弱的文风，李梦阳抨击“柄文者承弊袭常，方工雕浮靡丽之词，取媚时眼”。（《空同集》卷四十七《陵溪先生墓志铭》）又委曲批评茶陵派“迭韵竞侈连篇”之陋习。（《空同集》卷六十二《与徐氏论文书》）故四库馆臣称：“成化以后，安享太平，多台阁雍容之作。愈久愈弊，陈陈相因，遂至啾缓冗沓，千篇一律。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空同集》）文学风气既已如此，如何排除流弊、扭转归正，就成为郎署作家的使命。这期间，弘治十五年、十八年（1505）两科进士加入郎署，其中有康海、何景明等人，而康海的到来最为关键。康海为诸生时，为文“脱去近习，上追汉魏”，早被提学杨一清激赏。及至十五年春试，他的制策被孝宗列置第一。正是倚仗皇帝的褒扬，康海率先挑战李东阳。当别人仍仿习李东阳时，康海却“独不之仿”，并与关中籍作家结社，在文学

上与阁老分立。(《泮陂集·泮陂续集·康公神道碑》)

何景明就是乘此情势,进入弘治、正德年间的文坛,参与明代文学的发展进程。他与李梦阳等共结文盟,倡言学古,力挽痿弱文风。对此情节,明史馆臣描述曰:“弘、正之间,李东阳出入宋元,溯流唐代,擅声馆阁。而李梦阳、何景明倡言复古,文自西京、诗自中唐而下,一切吐弃,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。明之诗文于斯一变。”^[2](《明史·文苑传序》)而其所学之古,主要是指宋元以来的关中儒学传统和汉唐时期的中原文学传统。

关中儒学在明中叶曾一度复兴,而激扬者就是关学重镇杨一清。弘治七年至十五年间,杨一清提督陕西学政,创办正学书院,教导关中才彦,以复兴关学为己任。经他擢拔的后学,有李梦阳、康海等文坛主将,有吕柟、马理等儒学名家。何景明虽不曾从学于杨,却也视之为精神领袖。李何辈也果能弘扬关学传统,反对以理抑情,注重气节;反对寻章摘句,重视躬行。如王廷相倡“气本论”,用以矫正程朱官学的“理本论”,还人的性情以应有地位,隐然支持着李梦阳“真诗乃在民间”说。(《空同集》卷五十一《弘德集自序》)

他们倡言“文必先秦两汉,诗必汉魏盛唐”^[3],也是着眼于中原传统。中原是周秦、汉魏、盛唐文学的中心区域,师法先秦两汉文和汉魏盛唐诗,就是从文学上绪承中原传统。他们认为,先秦诗文之高古、秦汉散文之质实、汉魏诗歌之悲慨、盛唐诗歌之雄浑,正是中原文学传统的精粹,是历代文学中格调最高者。以诗歌学古例之,何景明有现身说法:“景明学歌行、近体有取于(李、杜)二家,旁及唐初、盛唐诸人。而古作必从汉、魏求之。虽迄今一未有得,而执以自信,弗敢有夺。”(《大复集》卷三十四《海叟集序》)

何景明虽与人共倡学古,却并没有消泯艺术个性。其诗歌

创作的鲜明个性,阐明在李何论辩三书中。^[4]与李梦阳诗歌创作相比,何景明艺术个性表现为:

(一)何景明虽不反对摹仿古人,但更看重独立创造。对此,明史馆臣评曰:“梦阳主摹仿,景明则主创造。”(《明史·何景明传》)其实在理论上,何景明既讲摹仿,也讲创造。何景明说:“诗曰:‘惟其有之,是以似之。’以有求似,仆之愚也。”又说:“曹、刘、阮、陆,下及李、杜,异曲同工,各擅其时,并称能言,何也?辞有高下,皆能拟议以成其变化也。”(《大复集》卷三十二《与李空同论诗书》)所谓“以有”、“求似”、“拟议”,表明何并不排斥摹仿。但他又说:“若必例其同曲夫然后取,则既主曹、刘、阮、陆矣,李、杜即不得更登诗坛,何以谓千载独步也?”(《与李空同论诗书》)此即主张不必拘守古人,摹仿古人是为了独立创造。

(二)何景明虽也尊重古人法度,但更讲究变化古法。李梦阳说:“古人之作,其法虽多端,大抵前疏者后必密,半阔者半必细,一实者必一虚,叠景者意必二,此予之所谓法圆而方矩者也。”(《再与何氏书》)又说,古法就是“古之所云开阖、照应、倒插、顿挫者”。(《答周子书》)何景明也说:“诗文有不可易之法者,辞断而意属,联类而比物也。”(《与李空同论诗书》)李何都关注词句、篇章、语言及结构之法,对古法的体认大体相近,差异在于怎么对待古法。李主张守古法而不舍,反对自创法式。(参《空同集》卷六十二《驳何氏论文书》、《答周子书》)何则认为,古法虽曾一度流传不坠,但魏晋之后渐趋于亡。有鉴于此,他不满“徒叙其已陈,修饰成文,稍离旧本,便自机阻,如小儿倚物能行,独趋颠仆”,而主张“推类极变,开其未发;泯其拟议之迹,以成神圣之功”,即谓变化古法。(《与李空同论诗书》)

(三)何景明虽也追摹格调风神,但更追求俊语亮节。李何辈都追摹先秦、汉魏、盛唐文学的格调风神,李提出“柔澹、沉着、

含蓄、典厚”四义,而何亦认同为“诗家要旨大体”(参见《驳何氏论文书》、《与李空同论诗书》);但因取径不同,又因性格差异,何景明更追求俊语亮节。他所谓俊语亮节,是指语言明快和音调清亮。这是针对李梦阳诗歌黯惨而提出的。李梦阳“闲缓寂寞以为柔澹,重浊剜切以为沉着,艰诘海塞以为含蓄,野俚褻积以为典厚”,不只乖谬格调风神,并且丢失俊语亮节。(《与李空同论诗书》)对李梦阳的这种失误,何景明似乎早有预防。他与李共倡学古之初,所作实验诗《明月篇》,即着意追求俊语亮节。该诗既追摹杜甫七言诗歌的“陈事切实,布辞沉著”,又仿效“初唐四子”诗歌的词彩清丽,音调流转。从何景明诗作的全貌看,追摹杜诗辄得沉郁顿挫,追摹魏诗辄得慷慨悲凉,追摹《诗经》辄得切实多讽……大凡有所追摹,皆能得其真似,做到圆转自得,力戒字剽句摹。

本来,何景明有机缘开创新文风。正德末,李何论文不合之后,他们各自分道扬镳,引导文学分途发展,促使文学走势分化。李梦阳接引中原以外的力量,突破中原文学之拘限,修订早前的学古理论,由学古转向文学复古,从而调整文学发展方向。而何景明利用督学陕西之机,修订学约与规程,疏通文学与经术的源流,将秦汉盛唐文学与宋元以来关学相衔接,阐明“文以会道,广道以成教”之旨趣。(《何大复先生年谱》附录《学约序一》)他如此立宗明旨,虽着眼在科举造士,而实际是肇新文风,开启文道合一的发展方向。可惜他英年颠殒,未使此途宏远。这就使上述艺术个性未及巨变,而成为他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。

当然,何景明的诗作也有缺陷,这在李何论辩中也有揭露。李指出何有些诗作“若搏沙弄泥,散而不莹,又粗者弗雅”,“阔大者鲜把持,又无针线”,如《月蚀》诗“妖遮赤道行”即是;又指斥何诗用语率易,支离失真,入野狐外道,“高而不法,其势如搏巨蛇、

驾风螭，步骤即奇，不足训也”。（《空同集》卷六十二《再与何氏书》）李梦阳的批评难免意气相使，但所说亦非凭空虚造。今按《大复集》所存诗，确有不少诗作粗俗不雅、高奇失法。如其古诗《梁甫吟》，以梁甫山为焦点，将相关和不相干的人物事件拼凑在一起，就显得粗豪不合经训。但不论存在怎样的不足，何景明仍不失为大诗人。这在他去世三十七年后，大文豪王世贞已有评定：“缘情即象，触物比类，靡所不遂，璧坐玼驰，文霞沦漪，绪飏摇曳，春华徐发，骤而如浅，复而弥深，疑无能逾何子而上者。何子为文，刻工左、史、韩非、刘家言，大抵于诗雁行云。……令何子不死，而称为名公卿已耳，所以削滌卑琐，振颓习，昌运，开中兴者，何物也功于经纶孰多？”（《大复集》卷首《大复集序》）

何景明成名后的诗歌创作，通常随他居处的变换，自然形成若干个时段，并大都及时得以结集，计有《京集》、《使集》、《家集》、《秦集》等。《使集》收录弘治十八年五月奉孝宗哀诏使云南，至正德元年五月返京大约一年间的诗赋之作；《家集》收录正德二年五月乞病归养，至正德六年初复任京职前大约四年间的诗赋之作；《秦集》收录正德十三年七月出任陕西提学副使，至正德十六年六月弃官归逝大约三年间的诗作。《京集》的情况复杂一些，它收录弘治十五年成进士至弘治十八年五月出使云南前、正德元年五月自滇返京至正德二年五月归居前、正德六年初复任京职至正德十三年七月之官陕西前，凡两度三次在京约十一年间的诗赋之作。这种自然结集形态，在嘉靖三年张时济辑《大复集》、嘉靖三十七年袁灿辑《何大复集》诸本里，均得以完好保留。兹编《何景明诗选》，也大体遵从其例，并在所选篇目“注释〔1〕”中指明。

何景明诗作今留存有一千六百多首，明清以来有少量篇目被钱谦益《列朝诗集》、朱彝尊《明诗综》、陈子龙《皇明诗选》、沈

德潜《明诗别裁》、汪端《明三十家诗选》、陈田《明诗纪事》等书选录,但迄今尚无成规模的能体现其诗歌概貌的选本。兹编尽量参考前人的选目,凡被以上诸书选录,且艺术性较强的诗作,该《何景明诗选》均予照录。其余篇目则依据编者的解读,遵循如下原则进行编录:(一)艺术性很强的诗作,大都予以收录;(二)艺术性较强且能体现其创作主张的诗作,尽量予以收录;(三)艺术性稍差但能反映其生平重要交往活动的诗作,酌情予以收录。所有选目均以明嘉靖三十七年袁灿辑《何大复集》为底本,参酌使用四库全书本和李淑毅等人校点本。

兹编注释条目以疏通词句、讲明事典和阐发诗艺为主,一般力求简明扼要;但有些事典较生僻,有些事典联用或化用,不易理解,则亦不惜文墨,务求详明。

〔1〕关于李何分异的具体情节,论者向来不甚明了,兹略作考辨如下。正德七年李东阳乞休,馆阁柄文的职能彻底消失。中央庙堂丢失了文柄,便需新魁来主持文盟。而最有资格柄文者就是李、何二人。然此二人谁占鳌头,仍需展开新一轮争夺。此时的情势是,李梦阳在江西任上吃狱,被迫解职闲居开封,交游日蹙;而何景明居任京职,据有利位置,且声誉日隆。在李梦阳看来,何应该帮助自己,谋求重新出仕,故于正德十年作《钝赋》寄示,表明藏时待用的愿望。何景明也心领神会,作《蹇赋》答之:“夫钝者,委时之弗利,无如之何,欲以藏用而自完,盖获予志焉。”(《大复集》卷一)即是说,自己也偃蹇不迁,恐无力相助,而劝慰李藏用自完。这样的答复当然让人失望。何景明无力帮助李,应属实情。若事态仅属此性,李梦阳应能理解;但问题不是这么简单。李梦阳对何的冀望太殷切了,因为何是京城唯一可信赖的人。而何景明表示“获予志焉”,这态度无异装聋作哑,怎不让李恼羞成怒。更甚者,他们都是文人,且都名满天下。如今李梦阳复出无望,岂不让何景明独擅文盟。这在心气高傲、性格粗豪的李梦阳,是绝对不能容忍的。就这样,李何分异肇端了。分异的具体展

开就是李何论辩。论辩应是李梦阳挑起的,其话题尽管多端,但潜台词只有一个,那就是当年两人共倡学古,究竟谁的方法对头,谁的诗歌写得更好,谁有优势来陵替对方。结果是谁也占不了上风,这场论辩只好不了了之。但分异并未因此打住,而是越走越远。先是李、何二人交恶;接着,以李何为核心的文学阵营瓦解,各自的门生及追随者分左右袒;最后各走一路,李将学古主张往复古道路上推进,何则诱导诸生走经术世务之道路。

[2] 关于李何倡言复古之说,需略作辨析校正。考李梦阳、何景明、康海、徐祯卿、王九思、边贡、王廷相等人的著论,正德末之前他们从未提过复古问题。即便李、何往返论争,也只是讨论如何学习古人,而没有提出复古论题。及至正德末嘉靖初,关于李何复古的认识还很隐约。大约正德末嘉靖初以后,文学复古意识才朦胧浮现。这是因为经过李何辈的长期推扬,各地域文人接受中原文学的影响,纷纷实验李何的创作主张,而使整个文坛普遍趋向学古。但为了保持各地域文学的独立性,他们不愿随李何去复兴中原文学,便提出更具包容性的复古论题。这样又反过来,将崛起的中原文学纳入复古思潮中。最早明言复古的可能是黄省曾。嘉靖初年,他倡言:“夫不复古文,安复古道哉!”(《空同集》卷六十二附录《与空同子书》)李梦阳对此积极回应,而不再申言早前的学古论。几乎同时,李梦阳给周祚复书,修正早前的师法古人说:“今人法式古人,非法式古人也,实物之自则也。”(《空同集》卷六十二《答周子书》)这与他《再与何氏书》中“模临古帖”之说相比,完全是另一种论调。稍后不久,“前七子”健在成员如王廷相、康海等,才意识到早年学古论的复古意义。由此可知,李何辈只是共同主张学古,而非一开始就倡言复古。至于复古的话题,是正德末以后才提出。学古与复古是两个时段的概念,二者有本质的区别:学古着眼于复兴中原文学,是李何和同时期的论调;而复古是一个文学思潮,是李何分异之后的绪论。只因后来论者不明这个时间差,而说李何一开始就倡言复古。(参饶龙隼《李何论衡》一文,《文学评论》2007年第3期。)

[3] “文必先秦两汉,诗必汉魏盛唐”出自康海和王九思的提倡,见《汉陂集·汉陂续集》卷中《康公神道碑》、《汉陂集》卷首康海撰《汉陂集